

符号学能被组织吗？我的四十年符号学生涯回顾

作者：埃罗·塔拉斯蒂

翻译：颜小芳

【作者简介】埃罗·塔拉斯蒂（Eero Tarasti, 1948—），男，芬兰人，赫尔辛基大学教授，音乐家，钢琴家，小说家，符号学家，国际符号学会（IASS）与国际符号学研究所（ISI）名誉主席。研究方向为：存在符号学、音乐符号学。

【译者简介】颜小芳，女，湖南永州人，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赫尔辛基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符号学理论与批评、当代文学批评与影视文化研究

一 引论

学科发展日趋制度化，学科发展的所有方面，如阶段性、转向、变化、稳定性，都渗透了这一特征。故而任何描绘符号学家生活的努力，都只能从某个主观视角进行；一切都取决于在国际化符号学运动中采取何种视角何种立场进行观察。因此，从我个人角度而言，我从一开始就将符号学看成是一项伟大的智力挑战——和冒险。符号学行政从来都不是一项轻松事业；如何能管理、掌握、控制那些预先就懂得如何操作或指导一般人的呢？他们是这些领域的正宗专家。然而，科学也总是包括团体与互动在内的社会事业。它不只是脑力活动，它并不意味人要被关进修道院去撰写关于世界的编年史，就像歌剧《鲍里斯·古多诺夫》第一幕中的修道士毕缅（monk Pimen）那样。

也有一些学者比其他人更倾向于组织和管理事情。格雷马斯曾经告诉我，说我的例子比较罕见，因为我在组织和发表学术这两方面都很活跃。对于一个卷入行政的教授而言，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也是危险的。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且转向行政的同事，都已经使用了另一种身份。他们几乎不跟先前的同事打招呼，他们将自身认同于那些如今充斥在大学董事会里的政客、行政官以及商人。基于我本人乃欧洲联盟教授的经历，所以我猜想其他地方在此领域也同样如此。通常这些同事被雇用去做那些认知力就科学本身而言已缩减的组织 and 行政事务，他们想通过统治他人来彰显自身的能力，而那会给人造成一种幻觉，即觉得自己在从事一项很重要的活动。这是实际上很久以前美国哲学家乔西亚·罗伊斯就预见过的很普遍的现象，当时他提出一个论点，即在三个人 A、B、C 中，最重要的人是 B，而 B ‘仅仅’起到在 A 与 C 中进行协调、传达、管理的作用。不过，按照查尔斯·傅利叶的观点，组织活动也许是人类心灵的一种情感；如果有人天生如此，那么它就是人性中一种不可避免的特征。不管怎样，我在这里想告诉你我的‘故事’以及总结我生命中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在组织符号学方面的经验。我带领过 IASS（国际符号学协会简称），伊玛特拉的 ISI（国际符号学研究所），以及正在主持一项由音乐表意和芬兰符号学社会这两个组织机构领衔的拥有 600 多人的国际研究项目。

二 初遇符号学：列维-斯特劳斯，格雷马斯……以及巴黎

事实上，一切都开始得很早。当我 22 岁时我恰好读到一本薄薄的书，作者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书名为《阿斯迪瓦尔的神话》，用瑞典语翻译过来的。突然间一个崭新的世

界向我敞开了：这是为我准备的。我之前研习哲学和音乐，服完兵役之后，我开始学习社会科学；在 1968 年前后，它们在年轻知识分子之间风靡一时。**列维-斯特劳斯**为我打开了通向符号学的窗口，不过那时候符号学被称之为结构主义。

然而，我不久注意到在我周围根本没有符号学。如果我计划写、说或者出版一些关于符号学的东西，首要任务就是创造一个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的周围团体。于是在赫尔辛基大学形成了一个阅读圈子或者说是以社会学、哲学和艺术专业的青年学生成立的学习小组。一开始大家称呼它为“结构主义小组”。通常几乎每周都会在我家聚会。我们阅读翻译成瑞典语的艰深的法语和意大利原文本，例如翁贝托·艾柯的《缺席的结构》等等。那时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很积极参加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生运动；对这些成员而言，结构主义显得与那种倾向于更加“现代”方法的智力分析类型格格不入。到目前为止，这种被认为不太适合学术话语的现象已经被结构主义方法所接受，如同罗兰·巴特通过他对现代神话的研究所展现的那样。另一方面，高雅文化现象例如瓦格纳、歌德等等，也对社会科学的学生开放。总之一切迷人的新世界对北部地区的年轻心灵敞开了大门。

然而，我见到的第一个有组织的符号学教学是在巴黎，我到那在 A.J.格雷马斯的指导下做博士研究。作为一名立陶宛人，他愿意接受我加入他那闻名的研讨课，通常那儿聚集了 100—200 名符号学的学生，特别是来自意大利和拉美地区的。来自北欧国家的只有几位，代表丹麦的学生和我。研讨课是整个未来巴黎学派的常规基础课。他们不仅仅是学生，还有一般来这见识和谈论符号学理论的老师 and 学者。在我看来，那是理想的符号学家们的团体。

但是，我发现我自己完全边缘化了，我没有和其中任何一位参加者成为朋友，并且不久我还发现几乎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因此，我决定将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翻译成芬兰语，可以这么说，是为了入门。我还听了列维-斯特劳斯和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我两次遇见罗兰·巴特，但他听说我在参加格雷马斯的研讨课时他失去了兴趣。

然而，对我而言在巴黎最重要且鼓舞人心的邂逅，是遇见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他是我年轻时的伟大偶像。这就是巴黎生活的特征，即便是一个年轻的来自北方的 23 岁的学生，也可以约会一位伟大的院士。这获益于我的一位普通熟人朋友，艾利-伽以佳·琯葛斯-马兰达教授的帮助，他是芬兰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同事；列维-斯特劳斯后来去了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我特别记得：当我对列维-斯特劳斯说，结构主义在像芬兰这样一个如此小的国家只能是对像巴黎这样的中心的反映，他打断了我：“不——中心总是在你是你自己的地方！”我与巴黎学者们的会面受到了位于圣杰曼大道专为外国访问学者设置的接待处办公室的帮助，那儿有位女士对我帮助最大，她为我组织了所有的那些聚会。

在这些条件下，巴黎，尤其是蒙榭尔普林斯第 10 街这个地址，格雷马斯的办公室，成为我符号学工作的中心。我知道当他在设置接待处时我总可以在星期四下午在那遇见他。当 1976 年我在巴西学习一年后返回巴黎时，我经过他的房间，他对我说：你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啊。尽管格雷马斯曾好心提出承诺帮我校对法文书写，但我的关于神话与音乐研究的博士论文答辩，是 1978 年在赫尔辛基大学而不是在巴黎进行的。

三 托马斯 A. 西比奥克的影响

于是芬兰的符号学组织立即开始了。1979 年 5 月，在赫尔辛基大学音乐系聚集了六个人，他们决定成立芬兰符号学社会。他们是亨利·布朗姆斯、尤哈尼·海尔蒙、奥斯墨·古斯，艾拉吉·贝吉勒与我。我开始起草常规会员信。不久韦尔摩斯·沃伊葛特，成为了我们的荣誉会员——事实上他早在 1973 年就在赫尔辛基大学开设了第一门关于符号学的课程——注意，芬兰社会从一开始就很好地将其开展的活动记录了下来，这是世界罕见的。

1979 年对符号学组织而言在很多意义层面都是决定性的一年。IASS/AIS 于这个夏季在维

也纳举行了第二次世界符号学会议。这次会议之前由沃伊葛特和匈牙利符号学家们例如布达佩斯研究符号学方法论的米哈里·侯帕尔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小的会前会议。我和我的学生离开了那儿；我在赫尔辛基大学取得了我第一个职位，音乐系副教授。维也纳会议是我参加的第一个真正大型会议。它由基希施莱格（Kirchschläger）主席主持开幕式，维也纳大学的古老大厅会聚了著名的符号学家们。沃伊葛特将我引荐给了翁贝托·艾柯。

然而，我在布达佩斯时已经见过了一位较年长的看起来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奥匈帝国混合体的先生，叫做托马斯·西比奥克。一段长期的友谊从此诞生，直到现在它还清晰回荡在符号学组织里。

西比奥克来自印第安纳大学的布鲁明顿校区，他一生都忠诚于印第安纳大学。然而他的背景是芬兰·乌戈尔语族，因为战后他通过在俄罗斯伏尔加的实验田野工作，学习过柴瑞密斯（Tcheremiss）族的神话学及语言，还被放逐到芬兰和拉普兰。1947年他出版了一本为美国军队使用的名为芬兰语口语的学习书。早在他还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时，他就选修了芬鸟语系，他的老师推荐他这样，以此作为一个测试：如果他能掌握芬兰语言，那么他能够很好地成为一位人类学家。因此他就去练习说芬兰语，且认识了那时顶尖的芬兰语言学学者与民俗学学者。这个背景后来经常被美国与国际符号学界所遗忘。他比其他人更是国际符号学运动的组织者。他在蒙特、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系列作品等等，为他人的展现创造了平台。

为了帮助他人作品的展现，西比奥克不久将我的专题论文《神话与音乐》拿去，在他的“走进符号学”系列再版了。然后他邀请我参加1979年10月在布鲁明顿举行的三次研讨会：IASS主席杰西·派克（在到达赫尔辛基大学之前，当我还是学生时我曾经在他的嘉宾演讲中见过他好几次）率领的波兰十人代表团参与的波兰美国逻辑学研讨会，查尔斯·S. 皮尔斯研究会的研讨会以及美国符号学社会的年会。这也是我第一次美国之旅。

我完全被布鲁明顿校园吸引住了，它位于美国中西部。不仅要感谢符号学及著名的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中心，我还要感谢著名的音乐学院。我记得在纪念会堂（Memorial Union）的聚餐，有翁贝托·艾柯、约翰·迪利、布鲁克·威廉、碧垂斯·噶勒萨·丘伦以及许多其他人出席，主持人是这所大学具有传奇色彩的赫尔曼·B. 威尔斯主任；因为他显赫的地位，他对我而言像是所有美国及其好的方面的符号。**西比奥克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毕生享受到了他所在大学对其研究方向的顶力支持。**后者的经验向我展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不可能如此成功地推进符号学的发展。

接下来在西比奥克的邀请下我连续几年参加了美国符号学社会的年会，接下来的一次是1980年于拉伯克德克萨斯技术大学举行的年会，然后是在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再接下来是圣弗拉西斯科的加利福尼亚。这是很重要的，不仅因为可以接触美国学者，而且我学会了如何组织这样的会议。这些会议的模式，连同其结构、商业餐会、竞选、展览、全会发言等等我都可以借鉴到我自己的芬兰研讨会中去，那是我学习组织符号学经验的学校。

四 符号学的扩张

我开始在芬兰组织“芬兰符号学社会”年会。第一次重要事件在芬兰中部的于瓦斯库刺大学实现了，我在那儿获得我首个艺术教育主席，时间是1979-1983年。这个事情发生在1983年的夏天，A.J.格雷马斯与一组法国同事例如弗朗索瓦·德拉朗德、埃里克·朗德伍斯基和萨奇·马丁等齐聚那儿。格雷马斯的演讲《第三次符号学革命》（*Vers la troisième révolution sémiotique*）被录成了影像，并且在ISI伊玛特拉发行了DVD。这是值得注意的事件，因为任何地方关于格雷马斯的纪录片都不太多。（事实上格雷马斯首次访问赫尔辛基大学是1979

年，但那时并没有拍摄纪录片。）

我在这里必须提及的是有时我觉得我的职务像是格雷马斯和西比奥克的朋友和同事，这非常尴尬。众所周知，他俩并不和睦。西比奥克称呼格雷马斯‘词学编纂家’，并且绝对反对他的学派，同时还兼有反法语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当我从布鲁明顿去巴黎时，格雷马斯曾经说过：美国人并没有取得多少进步，他们只研究黑猩猩。（*Les américains n'ont pas fait beaucoup de progrès. Ils n'étudient que les chimpanzés*）格雷马斯有些许遗憾因为我与印第安纳大学建立了如此密切的联系。但是对西比奥克而言，他的芬兰联系很重要。当我注意到从一开始在他的传真器里他只与艾柯和我有直接联系时，我为此而自豪。为西比奥克辩护的人会说不管怎样，西比奥克在他的系列出版物中出版了格雷马斯作品的英文版。

通过西比奥克，我还遇见了约翰·伽尔曼，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的主任。他是一名支持符号学的知识分子。因此 IU 出版社也成为了我的出版商，与之一道我们出版了几期《芬兰符号学学报》，这是我们在芬兰组织而成的国际出版物系列。

1983 年也是 IASS 在巴勒莫于布蒂塔教授领导下举行的第三次世界大会，许多芬兰人参加了。而西比奥克还在同一年于葡萄牙的埃斯托尼爾组织了高级研究所，主题是“符号学——国际学术语言”，受到北约（NATO）的资助。同年，诺尔玛·塔斯卡和她的丈夫约瑟·西布拉部长一起，成立了葡萄牙符号学社会；他们经营一种期刊，《符号学航线》。不过，因为只在《全国地理》杂志上刊登了这则消息，因此夏季课程中的老师比学生要多。伊塔马尔·伊汶-佐哈尔，来自以色列，而我自己则是唯一来自非北约成员国的人。

那些年里我们还与爱沙尼亚建立了日常联系。1982 年由爱沙尼亚语言文学所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在塔林进行，我第一次访问了那里。那时主要人物是爱沙尼亚语言文学所的副主任玛尔特·雷梅尔，一位极聪明的数学家和符号学家，他对计算机感兴趣。那时候访问塔尔图，一个在苏联领导下的封闭城市，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首次遇见尤里·洛特曼是 1987 年，他与他的学生伊果尔·捷尔诺夫一起访问赫尔辛基大学时。早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我们的学生结构主义小组时期，我们就有来自洛特曼学校的俄语讲师鲍里斯·噶斯帕诺夫。后来来自塔尔图的符号学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毕特尔·多诺普以及伽勒维·顾尔经常访问赫尔辛基。其他爱沙尼亚知识分子例如阿伊沃·陆赫穆斯以及作曲家里奥·诺尔梅特与我们联系也很频繁。然而，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用来教学则并非洛特曼的思想。他在赫尔辛基时告诉我，他几乎没有爱沙尼亚学生。这可能是因为克格勃（KGB，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允许学生去上他的课这样一个事实。洛特曼曾受人迫害，其中就有恩德尔·索格尔，共产主义者，塔林爱沙尼亚语言所的主任。他在爱沙尼亚作为一名犹太人和俄国人而被隔离。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西比奥克在他自己的印第安纳大学从来没有想过建符号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他说过符号学硕士点和博士点在美国找不到工作。因此他满足于他其他的国际活动。

五 伊玛特拉之始：ISI 的成立

1986 年，当地夏季大学的主任本迪·罗西，从伊玛特拉，我们东部边境一个相对无名的小镇，来到赫尔辛基时，芬兰在符号学组织方面于是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与亨利·布朗姆斯——我们协会的副主席、波斯语讲解员以及赫尔辛基商学院的图书馆馆长一起，在伊玛特拉，本迪·罗西组织了数天的“有效行政”会议。接下来，布朗姆斯想出了个主意：这儿为什么不能有个关于符号学的研讨会呢？当地市长伽勒尔沃·阿德拉支持这一想法，因此于 1986 年在伊玛特拉的文化中心，接近险滩的沃哥西河其岸边一座新的白色文化‘宫殿’是这个文化中心的招牌，在这里举行了第一次符号学会议。数世纪以来，这个地方曾经是芬兰观光游客最多的旅游胜地——当凯瑟琳大帝的整个俄罗斯法庭将从圣彼得堡来看瀑布——又再一次接纳了国际宾客。西比奥克当然在应邀行列，不久国家宾馆，瓦尔琼大酒店，一

座新建的艺术城堡，也成为了符号学家们的中心。

在伊玛特拉的第一次符号学会议，也有名叫“音乐意义”的研究音乐符号学的研究小组参加。“音乐意义”成立于巴黎有六位学者的法国广播电台的一次直播中。这六位学者是：考斯丁·米亚勒努，弗朗索斯·德拉兰德，吉诺·斯丹法尼，马塞罗·卡斯代拉纳，路易斯·黑特·考尔勒阿·德·阿泽维多和我。在这次重要的关于音乐符号学的电台节目之后，我告诉格雷马斯关于我们建立研究音乐表意的欧洲实验室的计划——这个题目是由马塞罗·卡斯代拉纳发明的，他是格雷马斯的一位西西里的学生；他说：把这个组织弄到芬兰去。我们在巴黎这里流浪不定，这个组织在这无法生存。因此我这样做了并且在伊玛特拉的第一次研讨会就有如此杰出的音乐符号学学者如丹尼尔·查尔斯、马耳他·葛拉博兹、伊万卡·斯多伊安诺瓦、弗拉迪米尔·噶尔布斯屈、雅洛斯拉夫·伊拉那克和伊果尔·雷茨尼果夫参加。现在这个项目已逾 600 会员并且已经在许多欧洲小城举行了 13 次国际研讨会以及在赫尔辛基大学与伊玛特拉举行了 12 次音乐符号学的国际博士与博士后培训课。

1987 年的夏季会议，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前会员们在伊玛特拉一次纪念性研讨会中聚会了。洛特曼不能亲自过来但许多流散在外的成员到来了，例如亚历山大·皮阿托果尔斯基，鲍里斯·欧奎本宁，安·舒克曼。托马斯·西比奥克当然也与会了并且谈及了初级与次级建模系统。还有像罗兰·波茨那尔以及山口昌男这样著名的学者，连同维尔莫斯·沃伊葛特和米哈利·霍帕尔都出席了会议。

然而，伴随这次会议还召开了第一次北欧符号学联会。这是第一次全北欧成员的研讨会，尤其来自挪威的符号学者们很积极。丹麦翻译符号学家丁达·L.果尔里在那里，还有联会的成立者们德鲁德·冯·德尔·发尔，艾勒那·黑尔博格、斯汶·斯多勒伏、于尔根·兰格达楞，来自挪威，于尔根·抵勒斯·约翰森，斯汶德·艾里克·拉尔森以及丹麦的彼得·布拉斯克。还创办了一种杂志，题名为《北欧符号学》。

在所有这些组织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是 1988 年。这是国际符号学所或 ISI 成立的一年。加拿大符号学者保尔·波伊萨克，他在多伦多开办他著名的结构与符号研究夏季学校，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他提出一个想法，建立一个研究所来指导全球青年符号学者的教育及教学。必须要有一个地方，让人们在此知道整个世界在符号学方面发生的一切事情；必须有一个数据库，学生们从中可以学会为了将符号学各种领域的知识专业化他们可以去哪里搜索。在这个办学的后面，他建立了一个由 44 位学者组成的执行管理委员会，但这是典型的西比奥克创新，这使得成立大会搬到了伊玛特拉。ISI 的主席会的候选人是保尔·波伊塞克和罗兰·波茨那尔，但最后我被选上了。芬兰媒体紧跟着报道了这件事；长篇报导发表在赫尔辛基主流报纸《赫尔辛基消息》上，并且电视 1 频道的新闻也提到了这件事。组成执行管理委员会的国际学者有里撒·布洛克·德·巴哈尔、保罗·布瓦萨克、玛丽亚·路西亚·桑德拉·布拉嘎、约瑟·罗麦洛·卡斯蒂洛、伊葛尔·沙扎诺夫、珍-克劳德·伽尔丁、碧垂茨·嘎勒萨·瓜尔龙、丁达·L.郭尔勒、克劳迪奥·果瑞、池上嘉彦、约根·丁斯·琼森、沃尔特·A.果池、亚历山多斯-巴黑顿·拉果波洛斯、李幼蒸、迪恩·麦克康奈尔、雅克·莫舍勒、米歇尔·欧·杜勒、里克·宾克斯顿、罗兰·波兹那尔、德比·布拉萨玛·帕坦纳亚克、莫尼卡·雷克特、约勒·雷索勒、费尔南德·圣-马丁、托马斯·A.西比奥克、罗普·塞克尼、安·M.舒克曼、R.N.斯瑞瓦斯塔瓦、果吉·斯泽佩、埃罗·塔拉斯蒂、泰里·施耐德哥尔德、柯尔文·特拉瓦尔登、萨尔瓦托·特里构、帕特里茨亚·维欧里、维尔莫斯·沃伊葛特、格劳里亚·卫特拉姆以及山口昌男。并且，皮特·斯多金那被提名为主席助手，且亨利·鲍姆斯成为数据库的主任。

研究生的目标定义如下（此文为保尔·波伊塞克撰写）：

“首先，将建立一个与符号学相关的所有先进教学和研究中心的国际化数据库；数据库要包涵由其他研究所和大学提供的项目信息，录取条件、奖学金、补助金以及学术奖金；其

次，要促进学生积极性；第三与 IASS 合作，负责和组织跨学科会议工作平台、课程和讨论课。”

为了履行这些任务，还有七个所谓服务不同地域的区域中心。澳大利亚、东欧、日本和东亚、拉美、北美、西欧。每个中心要搜集信息并且定期发给建立在伊玛特拉的 ISI。

这就是雄伟的蓝图。事实上，从来没有过书面规定。区域中心的想法被证明是不现实的，一些数据搜集了但依玛特拉中心并没有按计划接收区域中心的信息。但是，当注意到这点时，ISI 已开始自行运转，实现其目标的第三段篇章，即国际研讨会。这个夏天，伊玛特拉成为闻名的国际符号学会议与活动的中心。这些一直持续到现在。每年六月初都有夏季会议（为了避免与瓦尔比诺夏季学校重合，后来改到了 7 月）2014 年它从伊玛特拉搬到了考纳斯理工大学，达里奥·马蒂奈里继续担任研究所的主任。

不久之后，当多伦多符号学界不再愿意继续他们为结构和符号学研究开设的夏季培训班时，这个机构转到了伊玛特拉，然而，伊玛特拉的夏季会议，总是只持续一个礼拜。马索尔·丹尼斯的加拿大学生经常来参加这些活动。在严酷的芬兰冬天，每年二月初，ISI 开始为芬兰观众组织冬季培训。这些课程立即很受欢迎并且在芬兰扩大了关于研究所知识的传播，这当然对集结资金很重要。

教育部在瑞达·尤奥苏伽能部长的领导下，开始资助 ISI。瑞达部长来自芬兰。伊玛特拉市也在其市长岛诺·莫伊拉能的领导下十年间继续给予资助。还有贝尔迪·林都能。

研究所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早期度过了经济不景气的时期。但是现在在当下的危机中它无法继续承受了，因为教育部停止了为它拨款。

六 IASS 的继续

同时，IASS 继续发挥其功能。当切萨雷·塞格雷（Cesare Segre）离任主席时新的主席产生了，他就是杰西·派尔克。在他之后，罗兰·波次纳尔获得了席位并且持续了两界四年一期的时间。在他任位期间按，幸由杰夫·本纳德和格劳瑞尔·卫萨尔姆的帮助，秘书处坐落在德语区，即维也纳。他们很明显地扩充了协会的范围，并且使其地位变得特殊了。除了一个包涵每个国家 1-2 人的全国代表的执行委员会之外，还包括专业机构和其他。每天定期发布信息公告。IASS 见证了符号学新大陆的升起，尤其是拉美。在我 1976 年于巴西的学生时代之后，我在 1996 年跟随一个拉美旅游团又去了那并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哥、利马、桑托斯和圣保罗举办了讲座。拉丁美洲符号学的广度和深度实在杰出。墨西哥也非常活跃。IASS 还开始推进会议和关于“在 IASS 赞助下的”研讨会，并且创造了此种附属机构的形式标准。

IASS 一般议会反映了符号学在不同队伍、学校和学者中间唤起的强烈情感。在巴塞罗那/佩皮尼昂会议中，这是 IASS 首次一届会议在两个城市举办，会议必须确定下一次会议的地址。在伊尔门伽德·饶赫（Irmengard Rauch）的指引下，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入选了。当伯克利会议举行时，这是世界会议首次在欧洲之外的地方进行。那是 1988 年。再次需要选择下次会议的地址。拉丁美洲的人们还有很多其他人强烈支持瓜达哈拉哈作为会议地址。西比奥克及其他一些人提议赫尔辛基。在戏剧化的竞选中，瓜达哈拉哈赢了因此拉丁美洲获得了它们首次世界会议举办的机会。同时在蒙特雷拉、墨西哥、巴勃罗埃斯皮诺萨维拉组织了一次会议，他称之为第一次符号学与传播学世界大会，并且有能力召集了很多来自欧洲的符号学家去那里。来自墨西哥城的报纸和媒体来了并且对此事件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事实上，我不清楚为什么这个协会的会员大会总是容易变得如同风暴一般，充满激烈的争辩。国家与政治利益经常与科学问题混在一起。然而因为它展现了人们对符号学的巨大兴

趣，所以这也许没那么危险。他们非常投入地卷入到问题当中去（至少在大会上表现如此）。

罗兰·波茨纳儿能够安排下一次的 IASS 会议，是在德累斯顿，因此它又再次回到中心欧洲了。在德累斯顿，投票支持法国及里昂大学，里昂大学的教授路易斯·帕尼尔和本纳德·拉米泽特邀请大会去那进行。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参会人数达到每次会议 500-700 人。感谢西比奥克与他的妻子珍妮·尤米克-西比奥克以及柏林的蒙特·德古意特出版社，一直以来《符号学》刊物都能定期出版。在波次纳尔担任主席时期，副主席是约翰·迪利、热纳尔德·德利达勒，阿德里恩·吉美特-威尔什，亚历山大罗斯-费顿·拉果波罗以及埃罗·塔拉斯蒂；秘书处有杰夫·本纳尔德和格罗里亚·维他尔姆作为他的助手，财务处是马各多尔纳·欧洛茨以及助理财务主管理查德·拉尼冈。

不过在 2004 年的里昂大会上，波次纳尔两年的任期到了，新的主席以新的理事会诞生了。在这些条件下，IASS 确立了一个新的方向。我成为了主席，并且副主席有下列人员：阿德里恩·吉美特-威尔什，理查德·拉尼冈，李幼蒸和让-克劳德·姆巴勒伽。秘书长是约瑟·M. 帕茨·伽果以及副秘书长是果兰·索奈松，财务总监是苏珊·佩特里妮以及副财务总监是约翰·迪利。在马塞尔·丹尼斯的率领下，《符号学》编辑部移到了多伦多。也许更多是为了与符号学的地理扩张保持一致，选举和竞选了董事会。

然而有趣的是，似乎没人知道，直到这一天 IASS 有多少会员。人们不再交会员费，想想研究所带给人们的好处吧。但是，有非官方名单，也是由 ISI 提供的，有 2000 个地址，用来接收消息和信息。随着互联网便利的到来，这变得没有必要，果兰·索奈松管理网页，在 2009 年的拉科鲁尼亚会议之后，则是圣保罗的普里斯西拉·博尔格斯。

当我于里昂接管 IASS 的时候，我终于有勇气提议芬兰的赫尔辛基与伊玛特拉可以组织一下次的世界大会。这发生于 2007 年。这些会议的主题总是非常普通，因此每个人都能参加。符号学自身在如此多的领域和方向进行了探索，因此没有人可以掌握或控制它所到之处的生长。例如有这样的标题：人与符号。在我脑海中，这样的题目必须非常普通但也能够通过它们来反映出主办国家的传统和方向。在芬兰，我们刚刚拥有一个研究项目理解和误解，它受到芬兰学术研究院的资助。在那后面是讲座，曾经于 1983 年由美国语言学者研究跨文化误解的瓦尔伯伽 v. 拉斐勒-恩格尔在朱瓦斯居勒做演讲。作为我们的会议赞助，我们邀请了马尔蒂·阿提萨里主席；他在我们的项目小册子上写下格言：“符号学研究交流的所有模式。通过分析跨文化误解，它提升了人类的自我理解。”这些语词很适合阿提萨里，这位一年之后的诺别尔奖获得者。

七 芬兰的世界会议

而今我们在芬兰能够运用所有我们从组织已经超过二十多年的符号学大会上学习到的，不过是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因此对于一个世界大会而言什么是必须的？首先，你必须确定主题与全会发言人。根据曾经由维也纳大会提供的模式，有一系列关于芬兰文化的讲座。因此我们有赫尔辛基大学的教授和校长，伊勒伽·尼尼洛多，讲述芬兰的哲学；维尔莫斯·沃伊葛特介绍芬兰-乌戈里系符号学，来自爱沙尼亚的让·卡普林斯基发表他对于交流学的观点以及比勒约·古果能关于芬兰探戈。下一个问题是资金。自助资金会议的观点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外来资金。资助过我们的例如有芬兰学术研究院、伊玛特拉市、欧洲社会基金、芬兰文化基金会、尼伊诺·赫兰德基金会，意大利文化研究所、教育部、外事部、诺基亚与南部芬兰国家省会办公室。外事部提供了相当可观的资金来邀请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特别是女性（她们为我们 2011 年的夏季大会再次提供了帮助）。我提到过的上述清单对组织这些种类会议的人们而言是一个样本。接下来我们需要决定会议地址，我们同意在两个城市进行此事，首先在赫尔辛基，然后在伊玛特拉。对于去伊玛特拉的交通而言，我们租了整辆火车。赫尔

辛基火车站某天早上被巨大的人群充塞了，所有的符号学学者于此前往伊玛特拉。我们为 IASS 的董事会会议准备了一辆马车，这样即便是在旅途中，我们也能工作。正常情况下，这个世界符号学大会也被邀请到市里的冷餐招待会。这也同样发生在赫尔辛基。而开幕式在赫尔辛基大学的历史庄严大厅举行，伴随大学的交响乐团，演奏的是西贝柳斯的《芬兰颂》。

吃也很重要，它是会议的一部分，因为在中餐及正餐桌边，人们非正式地相互遇见，还能够讨论问题。在我关于世界大会的回忆中，里昂以其超级美味的餐桌宴代表着一个里程碑。不过，关于符号学学者们的自助餐餐边礼仪，可以推荐阅读列维-斯特劳斯的《餐桌礼仪的起源》。在芬兰，伊玛特拉提供了其著名的卡莱里医疗服务。为了办好一次世界性大会，还需要一群众多且积极性高的工作人员队伍。我们有一个 17 人组成的委员会，包括比勒育·古果能、达里奥·马蒂纳里、拜伽·拜索能、哈里·维沃、梅勒佳·鲍特斯、苏珊那·瓦里麦基在内的老师队伍，其他则是学生。在老学生活动中心搞了个舞会，赫尔辛基会议计划办成“跳舞的会议”，但事实上很少有人参加。符号学学者们似乎喜欢不那么正式的聚会。

大会之后，还有会议论文的编辑。多年来 IASS 的会议论文都没有能够以书的形式出版。由于 ISI 的帮助，我们有机制来做这样的事情，还有编辑们保尔·佛塞尔和里克·里特菲尔德两年的辛苦工作。会议论文于 2009 年在拉科鲁尼亚会议之前以三卷本形式结集出版。它们不包括全会发言论文因为发言者没有提交他们的文本，很可能是他们没有想到会议论文会以书的形式出版。

我认为 IASS 在国际符号学上有两个主要挑战：1) 组织世界性大会；2) 持续出版符号学刊物。而目前为止这两项任务已经完成了。在阿克·贝可以以及马尔西亚·施瓦茨的带领下，《符号学》是蒙特出版社的骄傲。丹尼斯拥有安德里亚·罗西以及保罗·阿米兰特作为他的助手。

伊玛特拉会员大会讨论了对不同洲而言的会员资格标准，IASS 收到了来自秘书长约瑟·马利亚·帕斯·伽果的邀请，将大家召集到他的家乡西班牙的拉科鲁尼亚去。又一次组织了理事会前会，举办地点被确认为是最合适的一次。拉科鲁尼亚会议的主题是文化交流/交流文化。因此符号学的交流方面得到了强调。会议原计划在港口漂亮的会议殿堂进行，但因为卷入了经济危机，于是就在大学校园里举行了，会议地点所在的几座大楼都是挨着的，所以很幸运，这被证明了是相当切实际的。在帕茨·伽果的创意下，室外全会的主讲是作家萨尔曼·拉什代。他讲了历史的意义，然后其整个演讲转变成很人文的风格因此这对所有聚集在观众席的数百位符号学学者而言是最恰当的讯息。当会员大会要选举产生新的理事会时，因为关于规则、关于谁可以在理事会继任以及谁不能继续的几项问题而再次充满风暴。执行委员会也将他们的民族问题拿到台面来由大家决定，这当然不是 IASS 议会的任务。然而在第一次长的会议时间终止之后，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两天之后需要再次集会。新理事会的组成人员与先前的相同，除了副主席不同之外，他们是保尔·库布里，约瑟·恩里克·非诺尔以及安妮·赫瑙尔特。巴黎学派也是第一次进了 IASS 的理事会。同时还决定了下一次大会将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

未来的中国举办方立即邀请理事会进行预备会议去参观会议的举办地点。这是在中国发生过的许多经历的第一次，伴随中国巨大的经济增长而来的同时是其符号学传统的生长与复兴。在这块土壤上耕耘的学者，他们之中，有李幼蒸，他长期以来致力于将符号学经典理论介绍给中国。南京之后，下一次符号学大会的准备工作已经启动，它将在索菲亚举行，由新保加利亚大学的副校长克里斯汀·班科夫率领，承办方是新保加利亚大学。在索菲亚举行的世界大会被证明确实是一次伟大的成功。保尔·库布里当选为新的主席，克里斯汀·班科夫任秘书长。

八 从意大利到保加利亚到爱沙尼亚

但是，IASS 的这些事件，对于不同洲的符号学其最多层面的发展而言，仅仅还是个开始或者框架。我仅从符号学组织的视角就我目前参与过的事情而言。在很多欧洲国家，出现了符号学硕士和博士点，不仅仅是在意大利，它一直都是符号学很有前景的国家。正如翁贝托·艾柯所说，意大利有很多的符号学，它与交流学一样。他在博洛格纳大学建立了全意大利语的符号学博士点，它的一部分课程在圣·马里奥由帕翠茨·维奥里和帕翠克·郭颇克带领进行。在意大利南部，奥古斯都·庞茨奥与苏珊·佩特里尼以及帕翠茨·伽勒法托一起组织了许多研讨会。为博士生们准备的研究，在这里进行得很好。在都灵，尤果·沃里与朱多·费拉里教符号学课，欧马尔·卡拉布莱塞在锡耶纳，伊萨贝拉·派茨尼在罗马大学（La Sapienza），阿布鲁塞瑟教授在米兰，乔安弗兰克·马洛那在帕勒莫。我几乎访问了所有这些地方，见到了他们天资聪颖的学生以及博学的教师。

保加利亚的符号学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新保加利亚大学一个私人研究所，由玛利亚·波波瓦率领，受其理事会主席，前大使波格丹·波格丹诺夫的资助。西比奥克、约翰·迪利还有我都访问过这里。这儿最重要的传统是早秋开设的符号学班，大多数都较早，并且现在还在位于黑海的索佐波尔进行。通过与意大利和希腊的符号学家合作，它培养了一个培训年轻符号学者的项目，甚至还有来自像爱沙尼亚和芬兰这样的北方国家的学生来这里访学。它的主任克里斯汀·班科夫，事实上是一个哲学家，他在赫尔辛基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是他现在对消费主义和应用符号学感兴趣。诸如广告、媒介、市场化、体育迷俱乐部等等话题，的确很受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年轻学生的喜欢。还有来自都灵大学及其教授尤果·沃里和马西莫·里奥那的强有力支持，后者还经营了一份新的符号学刊物，叫《义素》（Lexia）。

同时，在爱沙尼亚，符号学教学最后始于皮特尔·多诺普和伽勒维·顾尔。达勒杜大学鼓励纪念尤里·洛特曼，视之为最伟大的爱沙尼亚科学家，在其图书馆前为他立了一座现代主义雕像。达勒杜符号学中心具有杰出中心的地位和大量资金。这都是近期于 2000 年末至 2010 年初发生的事。爱沙尼亚的例子体现了对于组织符号学而言，重要的是要具有 1) 大学最高方向的支持；2) 牢固的民族学术基础和传统。在后一种意义上，爱沙尼亚可以借用洛特曼和于克斯库尔的名义立起来。

后者受到晚年托马斯·西比奥克的杰出帮助，西比奥克认为生物学是关键的符号学科学，是符号学未来的方向。雅各布 V. 于克斯库尔的儿子，图勒（Thure）继续研究生物符号学，联合丹麦学者的工作，共同形成了一门新的符号学研究范式。早期他们也在依玛特拉开会，由 ISI 主持会议。

九 作为实验的芬兰的符号学网络大学

符号学在芬兰打开了一个新阶段，最终，在第三方的请求下，欧盟接受了对由 ISI 指导的芬兰国家网络大学的资助请求。资金渠道来源于南方的卡累利阿人董事会，它是针对不适宜地区的所谓结构资金的一部分。它始于 2004 年，对 ISI 而言，多年以来这都是丰收之年。13 所国家大学加入了这个项目，其目的是于每所大学在既定的学科中培养符号学博士，但教育和监督指导基本上在依玛特拉进行。项目还包括符号学硕士层面的研究。网络大学还包括诸如国防学院这种特质，领头人是阿基-毛里·休蒂嫩教授，他采用符号学方法来训练军官。产生了一篇关于战略学的博士论文。我从未听说过符号学在部队其他地方使用过——除了在南京，我遇见了那儿国际大学的一位老师，后来我知道那所国际大学是一个军事学院，那位老师是一个将军。

毕竟，用欧盟的钱，在伊玛特拉来安排大量符号学教学课，且同时成立一个暂时的符号学主席位，都是可能的。第一任主席是来自赫尔辛基大学做文学研究的哈里·维沃，任期是

2004-2007 年。主席位设置在赫尔辛基大学，这让赫尔辛基大学在自身的符号学研究项目上获得了杰出的贡献。这个时期之后，主席位作为赫尔辛基大学的临时教授职位，被纳入到这所大学自身的预算中，这时的主席是一位研究皮尔斯的学者阿赫迪-维果·贝达里嫩。除了维沃，网络大学还有两名符号学副教授，达里奥·马蒂内里和古伊多·易卜森。

然而，尽管有了正式形式，但一切仍然处于临时基础之上，并且随时可能随形势变化而改变。事实上，当芬兰新的大学法规出台使所有早期国立大学私有化之后，这一切就发生了。人们至今还在讨论到底是什么影响着国家的科学，致使这个国家的学术生命如此繁荣，影响遍及全国。我们都可以证明，再次私有化是巨大认知变化的一部分，它意味着生活所有方面的完全商业化。IASS 的副主席，中国人李幼蒸最近写道：

在我们的大会中，我们会就 IASS 的未来与一般符号学进行许多重要的主题讨论。在所有重要问题里，其中最有意义的问题之一是关于当今世界的一般人文学术环境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商业化的世界，即便是在学术圈，其首要原则都是为了追求职业利益。我认为这可以是最严肃的问题：先前的人文学者追求真理，而今他们追求职业（个人的和集体的）利润。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实践的任何结果都可以用来继续我们的“职业”。这样的后果一定会使我们的科学追求与追求科学真理的经典观念断裂开来。如果学者们成为了商人之类的活动家，他们也能够采取在商业世界被认可的各种手段。如果我们符号学家也按照这样的规则来寻找我们的职业利润，我们符号学的将来会发生什么呢？

大多数智慧的人会认可这样的观点，即某些事情确实错了。大家都能接受，即一切民族、地区的结构、传统、工作、文化在这个巨大的全球化进程中消失了。当某些人开始算计一切时，这就开始了。之前完全没有被计算过的事情，现在被理所当然地算计进去了，它们拥有了一个标签。例如，就大学的设施而言。它们突然不再属于大学而是国家的财产了。然后大学不得不付给国家租金。然而租金却来源于国家财政预算。形势变得疯狂，钱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正常的教学工作受到连续不断的评估、应用、竞争、各种行政手段的彻底干扰，大学还不得不为了这些行政工作而雇用越来越多的专家。留给整个学术系统用来保持其基本功能的钱越来越少。这是芬兰的经历，很可能欧盟也是一样的。

十 SEMKNOW

然而，当罗瓦涅米的拉普兰大学进入历史舞台时，芬兰的符号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机构。这要感谢精力充沛的年轻校长毛里·育勒-郭多拉，他拥有曾在赫尔辛基大学的哲学教育背景，现在是罗瓦涅米的新校长，他想在那开展许多国际活动。伊玛特拉的 ISI，作为合法地建立在联盟基础之上但仍旧独立的私人研究机构，多年以来一直在寻求与大学合作。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尤苏·伽伊能女士担任部长期间，就提出过建议。尽管罗瓦涅米的地理位置，哪怕是距离赫尔辛基都较为偏远，但它成立了一个叫做芬巴伦支的机构，其唯一任务就是准备向欧盟提交申请。他们成功了，因为其 95% 的项目被布鲁塞尔接受了。他们还有一个比利时代理人，艾尔葛·姑勒根小姐，她来自布鲁塞尔，非常懂得要做什么。

因此，在拉普兰的率领下，欧洲通过了一项为设立博士点而提交的关于符号学的一项新申请，另外还有三个合作者：新保加利亚大学，它位于索非亚；意大利的都灵大学，爱沙尼亚的达勒杜大学。第一次争取支持的努力失败了，那是在 2007 年左右，我们的世界大会开展的时期。但是又做了第二次努力，获得了成功。于是成立了一个项目，其缩写名为 SEMKNOW。其管理者更换很快。现在，当三年计划即将结束，而项目于 2013 年在每个合作的大学开幕时，其管理者是伊里娜·格拉斯琴果。

项目的任务定义如下：

“我们博士点的目标是针对社会和经济区域提供和发展高水平的符号学专业应用能力，从而在劳动力市场具有竞争力。”因此这个项目是对欧洲所有教育程度达到硕士水平的新生代符号学者面临的挑战的回应，但对于未来的工作并没有任何特殊的观点。例如，许多国家的符号学博士给我写信，要求在芬兰工作，还有一些甚至拥有最高级别的欧洲大学的优秀论文。而许多其他人的职业，已经是博士了的，停滞不前，还有许多被迫回到大学或学校当老师。因此必须迅速采取措施，才能使得整个一代青年符号学者不会有失落或者被抛弃的感觉。为了有效地将劳动力市场的方向囊括进博士项目中去，决定与不同企业和机构签订公司协议，使得他们做好接收 SEMKNOW 博士生实习的准备。协议没有公司的承诺，可以用来真正招募这些候选者。但是人们从来都无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这个已经明确提上欧盟的日程，他们已经开始思考教育仅用来为工作做准备。

无论怎样，这都是符号学者们面对我们时代的挑战做出的实用回答。我们必须现实，即便有人反对生活和文化的完全商业化，即便有人支持激进的现象，例如“占中”运动，生态学，愤愤不平的学生，等等。符号学有个强有力的观点，那就是，无论任何时期，符号学惊人的容量，可以适应不同的周围环境以及范式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符号学仍然永葆青春——并不像朱莉娅·克里斯苔娃早在 1974 年说过的那样符号学已经死亡。

SEMKNOW 的另一个观点是它不会只注重任何特殊的符号学流派，而是重视整个符号学传统应该对学生开放。现在，拥有很多会议的计划阶段几乎结束，而所谓的项目（贯彻）实施阶段开始了。而这需要布鲁塞尔方面进一步的资金支持。然而，正如每个人都想弄明白的是，这只有通过经过职业训练的代理人，能掌握非常特殊的欧盟行话和官僚政治的，才能够获得。相应地，这个非常重要的试验计划，其先驱实际上是 2004 年的芬兰符号网络大学——这一年博士研究在全国水平上进行实验——现在却将其理念扩展到国际和泛欧洲场域。这个理念是，以后，任何履行 SEMKNOW 标准的欧洲大学都可以加入。同时还在讨论，培养双博士或至少通过导师合作的方式培养博士需要什么条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拉普兰的边缘地区发展而来，在这个项目启动之前，我自己都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但是我通过这样的事实来安慰我自己，即我知道也有很多住在里约或圣保罗的巴西人，他们从来也没去过亚马逊。但是，拉普兰大学是一所完全现代的大学和一个模范案例，即如何在一个极为狭小的语境符号学的乌托邦问题变成现实的这样一个模范案例。

十一 我们想要什么？

总之，对我而言，组织符号学，无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都是一项无止境的任务。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项西绪福斯的任务。“符号学仍然惊艳”，正如一本新书的标题所言。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符号学的生死存亡，仍然很难预料。当大学里的经费预算减少，符号学的存在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它在预算表中处于哪一列。如果它处于现在看来一个时髦的称谓“创新科学”的类别，那么它也许有生存的机会。如果不是，它仍然可以作为某种先锋思想或边缘运动而存在。符号学仍然可以成为具有乌托邦性质的事物，如同汉娜·阿伦特所言，无限不可能（*improbabilité infinie*），成为某一天突然变成现实的事物。在当前网络革命以及脸书时代，符号学并没有失去一点点现实性。有人在媒体上问，当我们很容易在网上搜索到教授们课堂上讲的内容时，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大学呢？这是一个很荒唐的想法，因为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一个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当年轻人还不成熟，还不明白他们是谁、他们需要什么的时候，他们可以提问的地方。当日本符号学家山口昌男退休时，他在他国家一个遥远的乡下建立了一个佛教禅修中心和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符号学大学。

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建立符号学大学的可能性吗？这个大学可以教人们一些理论，来应

对信息洪流，如何从不重要的信息中选择、挑选、甄别出重要信息。索罗门·马尔库斯最近提出大多数人处于文化奴隶的状况，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符号学家应该揭示出这个真相吗？这是符号-伦理的问题。年轻人有权利无知，他们的权利是在厄尔斯特·布洛赫“尚未知”的范畴（noch nicht, not yet），这个概念是布洛赫在他的《希望的原则》（Prinzip Hoffnung）中提到的。也许我们符号学家们也属于“尚未知阶层”，因为我们是我们所研究的符号的永远的学生。

注释：本文选自埃罗·塔拉斯蒂《存在与表象：探索存在符号学》（德古伊特出版社，2015年）